

「鏡城」中的中國網路厭女與數位女性主義發展困境：以微博「太空人雅集超話群」為個案

譚舒月、王雅韻*

摘要

本文以「太空人雅集」微博超話群為個案，通過話語分析考察中國社交媒體上的厭女話語。研究發現，中國網路厭女與女性主義高度對應且同樣流行。而厭女者不僅通過話語建構出貶損性的男女鏡像身份，通過文化組織龐大卻隱匿的厭女聯盟，對數位女性主義運動做出集體性反擊。更有意或無意地不斷借用中國傳統文化、國家主流話語及平台資本等要素，建構比「funhouse mirror」更為複雜的「鏡城」，吞噬和抑制中國數位女性主義的政治潛力。

關鍵詞：中國數位女性主義、批判話語／論述分析、流行女性主義、流行厭女

投稿日期：2023/03/26 通過日期：2023/11/24

本文作者十分感謝常江教授在文章撰寫過程中給與我們的支持和幫助，感謝兩位匿名評審專家對文章初稿提出的寶貴建議，亦感謝期刊編輯團隊在文章校對過程中所做的辛苦工作。

* 譚舒月 深圳大學傳播學院碩士研究生 tanshuyue_yome@163.com
王雅韻 深圳職業技術大學經濟學院講師 wangyayun867@yeah.net (通訊作者)

Chinese Online Misogyny and the Dilemma of Digital Feminism in the “Mirror City”: Take the Sina Weibo Super Topic Group “the Distinguished Gathering of Astronauts” as an Example

Shu-Yue Tan & Ya-Yun Wang*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Sina Weibo super topic group “the Distinguished Gathering of Astronauts” is used as a case study to explore misogynistic discourses on Chinese social media through discourse analysi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online misogyny is highly comparable to popular feminism in China. Misogynists appear to use discourses to construct derogatory mirrored identities for both men and women. In addition, they form secret misogynist alliances to collectively counterattack online feminist movements. The interplay of elements such as Chinese traditional historical culture, the authority discourse, and commercial platforms leads to the formation of a more complex “mirror city” than the “funhouse mirror” and limits the political potential of Chinese digital feminism.

Keywords: Chinese digital feminism,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popular feminism, popular misogyny

* **Shu-Yue Tan** Postgraduate student at the School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Shenzhen University, China tanshuyue_yome@163.com

Ya-Yun Wang Lecturer at the School of Economics, Shenzhe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China wangyayun867@yeah.net

壹、前言

不同於西方女性主義者將社交媒體活動作為線下示威活動的補充，由於中國政府對集體示威、遊行的警惕，社交媒體已成為中國女權主義者發展事業的重要陣地（Zeng, 2020）。此外，隨女性網路用戶規模擴大至 6 億（QuestMobile 研究院，2023 年 3 月 7 日），以及 MeToo 運動產生的連鎖效應，近年來中國網路上湧現出大批以提高「可見性」為核心邏輯的數位女性主義（digital feminism）運動（馮劍俠，2020）。而與運動相關的泛女性主義內容，也逐漸成為商業媒體平台上的熱門話題和重要商業標籤。但與女性主義的大眾化相對應，厭女也逐漸成為一種流行的網路現象。據《澎湃新聞》（2023 年 3 月 23 日）報導，至今仍擁有四百多萬參與者的百度「孫笑川吧」，存在大量靠辱女取樂的內容，部分文本甚至涉嫌觸犯《中華人民共和國網路安全法》。

該群體是中國當前最具代表性的網路厭女社群，其源頭可追溯至鬥魚網絡主播孫笑川和李贛的直播間。兩人常以故意激怒他人的方式（又稱為釣魚）嘩眾取寵，吸引了一批反傳統的「粉絲」。他們熱衷於攻擊而非崇拜孫笑川，並樂於模仿二人的風格，在各種媒體社交平台上以造謠、反串、釣魚等手段，引導特定的網路暴力。《光明日報》（2018 年 8 月 28 日）曾將這種文化批為「新型網路暴力」。而該群體不僅在論壇這一強趣緣型社交媒體平台形成了相對封閉的興趣導向社群，也活躍在中國最大即時資訊分享公共平台——微博上。在該平台上，他們不僅能通過超話（super tag，超級話題的簡稱，是微博網站經營的供粉絲聚集進行話題交流的興趣內容社群）功能組建更隱蔽的超話群聊，也更容易接收到女性主義運動相關資訊並做出反應。於是他們慣有的攻擊手段近年來越加頻繁地被用於在微博上攻擊和汙名女性，例如使用虛假身份網暴那些呼籲女性要自信的網紅博主，¹偽裝成追男愛豆（idol 的音譯）的非理性女粉絲，²編造虛假新聞和「釣魚」言論引發男女對立輿論等。

如果女性主義在網路空間追求的是「可見」，這些使用隱匿式攻擊手段的厭女者則追求著鏡像式的「不可見」。同時，儘管因為組織網路暴力和發表敏感言論，該群體的聚集地不斷被封，但他們依然能通過

關鍵字、微博話題不斷再次聚合。其內部亞文化（稱為抽象文化）更是將這些厭女者跨媒介平台鬆散連結，組建巨大卻又隱匿的中國網路厭女聯盟。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中國網路厭女研究多關注對某一平台的厭女話語進行分析（甘麗華，2021；Han, 2018），而少聚焦具體的厭女者群體。但實際上網路厭女已成為一種流行文化，吸引、促使同一批人在不同平台聲討女性主義，並最終推動中國網路上的性別討論淪為厭女者與女性主義者以「極端」互斥的粗暴戰爭。

已有大量研究指出，女性權力的崛起會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引發男性對女性主義的抵觸與反噬（Han, 2018; Messner, 2016）。Banet-Weiser（2018）將這種厭女和女性主義之間的反應關係進一步總結概念化為「funhouse mirror」，提出流行厭女通過積極且持續地曲解現實、佔用流行女性主義的核心議題，重申舊有性別權力秩序。但該理論以歐美社會文化實踐為建構背景，以批判西方新自由主義對女性主義的制約為基本立場，因此無法簡單應用於完整理解中國網路厭女的相關實踐。而在國家政治力量依然深刻地影響著商業媒體社交平台（Liao, 2023）與活躍其上的女性主義話語行動（Zeng, 2020），並持續重申傳統儒家文化的背景下，女性究竟面臨著怎樣的網路厭女者？他們出於怎樣的社會心理結構，對數位女性主義做出了哪些鏡像式反應，從而制約其發展？這一切又折射出了怎樣的中國數位性別空間？是需要進一步考察的議題。本研究試以中國最大媒體社交平台——微博為視窗探索以上問題，以期更深入地揭示中國社會的性別生態及其媒介再現，並推動西方理論的本土化。

貳、文獻回顧

一、流行：數位空間中的厭女與女性主義

大量研究指出，數位空間能夠集結女性進行集體表達，提高女性主義和性別議題的能見度，對顛覆傳統性別權力結構具有重要意義（Baer, 2016; Zeng, 2020）。「賦權」、「可見性」也成為數位女性主義中

文研究的高頻關鍵字（馮劍俠，2020；曾麗紅、葉丹盈、李萍，2021）。但網路不僅賦權於女性，也給厭女者的集結提供了便利和平台。現有研究已指出，厭女者已依靠共用性別建構和權力結構的核心思想鬆散連接，形成了 Manosphere 等越加具有影響力的網路厭女社群（Ging & Siapera, 2018; Ging, 2019; Van Valkenburgh, 2019, as cited in Han & Yin, 2023）。如今，厭女和女性主義都在多個數位媒體平台上進行表達和實踐，吸引、聚集志同道合的同伴，使「流行」（popular）成爲二者在數位空間中的共同突出特徵（Banet-Weiser, 2018, pp. 1-2）。

而從「流行」這一視角研究厭女和女性主義，不僅從宏觀視角出發強調二者具有共同特徵，也關注二者間鬥爭式的關聯性（Banet-Weiser, 2018, p. 2）。厭女與反女性主義之間本有一定區別，前者更多涉及行爲和態度，後者則是一種政治價值觀。但二者之間的邊界在數位時代越加模糊（Ging & Siapera, 2018）。網路厭女和女性主義不僅各自內部存有不同流派間的鬥爭，二者之間也可見被概念化爲「funhouse mirror」的動態鬥爭反應關係（Banet-Weiser, 2018, pp. 41-64）。流行女性主義的核心主題——追求「自信」，在「funhouse mirror」中被曲解爲一場零和遊戲：女性擁有信心，意味著閹割男性的信心（Banet-Weiser, 2018, p. 109）。同時，女性主義的大眾流行性又刺激著越來越多厭女者開始反對女性主義，利用網路匿名性對女性、尤其是女性主義者進行暴力懲罰，以強化性別權力關係（Ging & Siapera, 2018）。在後社會主義中國，攻擊網路上代表「中國特殊女性主義」（made-in-China Feminism, 簡稱 C-fem）的部分中產女性，已成爲男性彌補失權感的重要手段（Wu & Dong, 2019）。

除了自信，憤怒（rage）以及更廣泛的「情感性」，也是流行女性主義和厭女的核心命題之一（Banet-Weiser, 2018, p. 171）。數位女性運動中的情感力量正孕育著某種新的、至關重要的可見性，以解構和重新配置性化、性別化的權力結構（Mendes, Keller, & Ringrose, 2019）。在中國數位女性運動的研究中，也有學者指出中國 MeToo 運動的重點是通過共情實現治療（常江、金兼斌，2018），情感維繫著該運動的凝聚力（馮劍俠，2019）。而與流行女性主義強對應的流行厭女同樣具有強烈的情感色彩，例如在對「楊笠事件」³的討論中，男性女性網友均具有極其強烈的情感傾向，男性網友在其中更是表達了極其負面、激

進的情緒、語言和性別歧視 (Hu, Luo, Peng, & Lin, 2021)。不過目前少有研究關注到中國厭女者的內部互動，解析他們的情感、仇恨來源於何處。

此外，從「厭女」(misogyny) 研究脈絡出發，關注流行女性主義與流行厭女的呈現出的鬥爭式關聯性也具有重要意義。厭女早期研究多從心理學出發，認為男性通過厭女緩解閹割焦慮、挫折感、依賴心理 (Gilmore, 2010, pp. 151-168)；也有社會學家提出，厭女、男性同性社會性欲望、恐同三位一體，以強制異性戀為基礎，形成維繫父權社會男性紐帶的裝置。(上野千鶴子，2018／王蘭譯，2023，頁 230-238)；而立足道德哲學與社會政治學，則強調厭女是強化父權秩序的執法機制 (Manne, 2017, p. 19)。這些來自不同領域的研究都強調厭女不只是情緒發洩，而是通過貶損女性維繫父權意識形態。但目前厭女研究依然缺乏一個重視關係性、情感性的全面理論框架 (Wrisley, 2023)。因此，基於學術研究和現實兩個層面的需求，本文以「流行女性主義與流行厭女的鏡像關係」為理論框架，進一步探索中國厭女網友被怎樣的情感、思潮連接，他們對女性表達的自信、憤怒作出了怎樣的反應？中國的數位女性主義與網路厭女之間存在哪些可見與不可見的鬥爭，又以怎樣複雜、矛盾的形式相互呼應？

二、烙印：中國女性主義裏的國族與男性

對新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的批判，是流行女性主義研究的重點之一 (Banet-Weiser, 2018, pp. 27-30)。其核心邏輯是，新自由主義經濟不僅將女性主義簡化為通過消費獲得個體「自信」與「解放」，也通過商業社交媒體平台推動這種去政治化、高商業性、將女性結構性困境框定為個人問題的女性主義獲得最高可見度，使其成為一種流行。而這種高可見且與資本緊密聯繫的女性主義，也極易刺激全球經濟衰退後，面臨男性氣質危機的男性。並讓他們認為自己才是貧困、自信受挫的受害者，不斷通過消費就簡單獲得自信的女權主義者則是罪魁禍首。這一整個厭女者鏡像曲解現實、佔用女性主義議題的過程被概括為「funhouse mirror」(Banet-Weiser, 2018, pp. 92-128)。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國女性主義並未能逃離這種新自由主義的影響 (魏

開瓊，2015/2022；Peng, 2021）。但通過回顧相關文獻，可發現兩個權力主體在其中產生了比資本更深遠的影響，二者是研究中國女性主義需要重視的特殊文化烙印。烙印之一是國族。現代中國女性主義話語萌芽於反帝、反封建的抗爭思潮（Zhou, 2003），自誕生起便與國族革命密切聯繫。在後續發展中，也基本由國家自上而下地集結和指導女性。而無論是發展初期，鼓勵女性抹去性別特徵參與革命政治運動的「婦女能頂半邊天」（Zeng, 2020）；還是在 1978 年改革開放後，宣揚回歸傳統性別價值觀，以維持社會穩定和集體利益的「女性回歸家庭」（Billioud, 2007; Wallis, 2017）；這些集結並高度指導女性的國家性別話語，都更注重國家發展戰略需求，並在忽視社會、文化結構性不公的同時，給女性增加了新的性別規範與枷鎖。但近年來中文數位女性主義研究依然以關注數位技術或其背後資本，如何賦權，又是否「負權」為重點（曹晉、代詩眸，2022），在一定程度上忽視或回避國族力量對中國數位女性主義深刻影響。

部分英文研究已經逐漸注意到中國國家政權與平台的合謀，提出在政府近十年來對女性傳統美德的重申與呼籲下，那些脫離國家認可的草根、非合作的女性主義者的帳號和內容常被封鎖（Zeng, 2020），留下的則是那些更容易圍繞消費主義和精英女性展開的、對主流社會秩序不懼威脅性的、「被允許的」女性主義（Fincher, 2016）。反女性主義話語則因受到較少的審查而得以逐漸興盛，並將公眾的注意力從系統性的性別壓迫轉移到女性主義者與反女性主義者之間的對立（Huang, 2023）。這些現象被概念化為「平台化厭女」（platformization of misogyny, Liao, 2023）和「被國家認可的厭女症」（state-sanctioned misogyny, Han, 2018）等概念。但與這些研究所提出的「審查」相呼應的，正是中文相關研究中對於國族這一烙印的回避和難以言說的空白。

另一烙印是男性。不同於西方初期女性運動對男性的排斥（Hooks, 1989/2015, p. 127），男性甚至是中國女性主義起源的主導者。中國女性主義起源與國族革命緊密交織的原因之一是，精英中產階級男性認為受先進文明教育的婦女是優秀的妻子和母親，才能成為有教養的男人的榮耀，促進國家民族獨立富強（Bulliet, 2000／陳祖洲等人譯，2001，頁 70-71）。在對近代中國第一部論述婦女問題的專著《女界鐘》的分析研究中，亦能看見女性學者明確的批判，「近代中國

女性主義的萌芽和原動力竟是男人／男權在帝國主義衝擊下所產生的自卑」(王政、高彥麗、劉禾, 2005, 頁 2)。在這種敘事下, 中國現代男性在實際遮蔽女性的同時, 具有了仿佛天然合法、正確的現代女性主義者身份, 亦或更委婉恰當的稱號——平權主義者。

兩個權力主體的影響相互交織, 使男女平等作為基本國策得到中國當代厭女者的贊同, 而實際存在的性別問題則被他們理解為歷史遺留的階級矛盾和「西方敵對勢力」的滲透 (Huang, 2023)。中華田園女權 (女權是 feminism 的另一翻譯, 二者含義完全相同, 厭女者偏好使用「權」來強調女性主義者的攻擊性)、女拳等反女性主義的汙名詞匯, 在中國語境下常與「真／偽女性主義」的討論緊密聯繫 (甘麗華, 2021; Yang, Guo, & Arteel, 2023)。這些辭彙不僅是攻擊和反對, 而是對定義權的爭奪, 並試圖利用主流意識形態進一步合法化、維繫男性定義權, 以應對主導敘事危機。

因此本研究認為, 如果自《女界鐘》起, 男性為主體的國族主義就與中國女性主義思潮緊密交織 (王政、高彥麗、劉禾, 2005, 頁 1-29), 更逐漸成為其烙印。發展至今的中國數位女性主義或許不應該局限於聚焦女性的女性運動, 分析中國女性主義的策略性、含蓄性, 而應該揭露是怎樣的社會結構催生了這種策略性。不僅要「發聲」, 更要「回嘴」 (talking back, Hooks, 1989/2015), 將研究目光轉向男性厭女者, 看他們如何建構女性主體和自我主體身份, 國家話語、歷史文化又在這一過程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三、鏡像：建構中的身份與話語

中國網路厭女研究目前主要集中於對厭女話語觀點進行分析, 但較為忽視這種話語與文化、與女性主義的反應關係。而且具有流行性, 能夠聚集大眾的厭女話語, 不僅關乎互動, 更與話語使用者身份及其認同緊密相關 (Hymes, 1973)。語言學視閥下的身份建構研究主要來自三個方面, 語境、敘事、以及權力 (項蘊華, 2009), 即人們在特定語境中, 受意識形態和權力的影響, 選擇強調某些自傳性敘事而忽略另一方面, 從而建構動態的身份。Stuart Hall & Paul Du Gay (1996, p.

2) 認為「身份認同」(identification) 也是一種動態的建構過程，且與共同起源或共有特點的認知基礎密切相關。而起源和特點被不同群體共用或共同排斥，便形成了相反的圈子，例如「funhouse mirror」中鏡像對應的厭女社群和女性主義社群。

此外，線上話語實踐不僅是一種身份建構，也是一種行動，並被第四波女性主義浪潮 (fourth-wave feminism) 視為主要行動模式 (Retallack, Ringrose, & Lawrence, 2016)。話語行動意義上的「鏡像」是一種策略，指模仿和借用其他群體的策略、符號、口號和目標 (Sargent, 2007)。韓國女性主義者的相關實踐最具代表性，她們正積極使用以話語為主要形式的「鏡像策略」進行女性主義運動，即在網路空間中針對詈語（髒話）中的性別歧視，反向建構歧視男性的話語 (Moon, Kim, & Park, 2023)。近年來中國網路中也有越來越多人開始使用這一策略，如使用「國蝨」（與中國男性簡稱國男同音，意為害蟲）等厭男的話語辱罵中國男性。被積極使用的「話語」也是女性主義研究的重要議題。此類「鏡像話語」在學術意義上屬於 Chris Weedon (1987/白曉紅譯, 1994, 頁 127-132) 提出的「倒置話語」(reverse discourse)。目前中國對廣義層面女性話語運動的研究落腳點較為一致，大多通過對某個具體的女性網路群體進行實證研究，強調女性話語行動的性別解放潛力與政治意涵 (曾麗紅等人, 2021; 馮劍俠, 2020)。

但本文想提出，這樣的強調正在忽視話語的「非強制性」，忽視高可見性的新女性話語正在被大量不同的群體看見和闡釋。正如 Kristeva (1969, p. 146) 所言，任何文本都建構於已有話語基礎之上，任何文本的構成都是對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轉化。被當前研究所忽視的網路厭女者，在被「厭男」話語刺激後，不僅可以引用傳統的厭女話語，亦可在「不穩定」的話語空間對女性創造的鏡像話語有所吸收，進行轉化、創造。二者之間不斷刺激、反噬，對應著走向各自的極端，共同建構出觀點、情緒極化的平台。使得「鏡像」也成為話語行動與鬥爭的重要隱喻。

戴錦華 (2018, 頁 86) 曾用「鏡城」喻示 20 世紀 90 年代中國繁複的文化圖景，旨在通過描述大眾文化興盛背後，國家政權、民族主義、資本、民衆、消費主義等諸多不同主體或意識形態，如何彼此衝突

卻又相互借重、對應為鏡，從而揭示中國文化共用空間的複雜性。而本研究在同樣關注中國語境複雜性的視域下，試將這一概念做一定的挪用，用於概括中國數位空間性別文化的鏡鏡相映、駁雜多端。試分析資本、國家政權、傳統文化等命題，如何與厭女不斷隱匿合謀，又是如何吞噬女性主義的政治潛力，使供中國數位女性主義發展的場域已從「funhouse mirror」發展為一座幻影幢幢的「鏡城」。

參、研究設計

「太空人雅集」微博超話是微博代表性厭女群體目前的聚集地，而最終選擇將該超話的超話群聊天記錄作為研究文本主要出於以下三個原因：首先，該群需要回答一定的門檻性問題才能加入，因此成員主要由群體內的積極參與者構成，發言更具代表性，也因群聊相對私密而更具真實性；其次，該超話群非私密群，符合研究倫理；再次，超話群聊內容很少被平台封鎖，而且消息一經發出群內所有人都能即時接受並發出回應，適用於召集人進行集體行動，並進行即時的交流、評價，所以便於瞭解厭女者的行動過程。

在數據收集方面，本研究採用爬蟲技術，以「唐山打人事件」⁴這一標誌性性別暴力案例的發生時間——2022年6月10日為標誌點，收集了該群從2022年6月1日至2022年9月10日的所有聊天記錄，共計九萬多條。但因為文本中包含大量諧音辭彙、內部黑話，所以又人工依據對話語境、語意將單條資訊進行整理、合併，形成一組組完整對話，並將其作為具體分析的文本。

在文本分析框架上，本研究選擇使用 Norman Fairclough (1992) 的批判話語分析三維模型。該方法將話語分析大致分為三個可重疊的向度，但並沒有規定詳實、固定的操作步驟，而本研究的文本屬於日常非正式對話，且研究重心在於關注該話語背後的社會文化與權力關係。因此在研究過程中弱化了文本向度的語言學分析，更關注話語實踐向度對厭女話語如何生產、配置及使用過程的分析，以及社會文化向度對此類話語背後權力及意識形態運作軌跡的分析。在具體操作上，

筆者首先細讀文本，總結高頻詞。發現該群體的討論，在語法層面高頻使用「我／我們」和「她／她們」等相關主語字詞後，將其分類、抽象總結為兩類概念，並圍繞這兩個概念進行語料庫搭建。形成語料庫 1——關注對自我身份、群體的表述，共計 2,510 條消息，分為 129 組文本。關鍵字：我、我們、鼠鼠等。語料庫 2——關注對女性群體的表述。但需要說明的是，由於該群體在描述女性群體時，往往涉及對女性主義運動的反應。因此在收集和搭建語料庫 2 時，本研究將「唐山事件」中該群體對女性抗爭話語行動的反應作為了重點。共計 10,432 條消息，分為 344 組文本。關鍵字：她、她們、婊、拳等。此外，共用性身份和共用性實踐不僅是該社群的主要話語內容，也是網路社群的重要研究層面（Baym, 2010, p. 75），但語料庫中身份和行動的話語存在一定的重疊。所以為了突出特徵，本文在整體分析框架上「身份」和「行動／實踐」兩大版塊。

在微觀分析框架上，本研究重點借鑒了 Norman Fairclough (1992, p. 102) 提出的「互文性分析」。該概念主要強調文本存在於社會文化、歷史的情境中，重視分析文本如何改變之前的文本，如何建構新的話語或文類，從而創造出新的習俗。因此，本研究重點關注該群體應用了怎樣的厭女話語，對傳統厭女辭彙是否有引用或改造，又是否創造了新的厭女辭彙，以及厭女和厭男的仇恨話語如何相互引用、影響，並結合中國歷史文化語境對話語的創造、使用、傳播的過程進行分析。

肆、鏡像身份與鏡像話語行動：研究結果與分析

一、鏡像身份

(一) 「我們」

1、顛覆「正常」：戴面具的狂歡社群

傳播仇恨的網路暴力被該群體總結為「不正常」，在語料庫 1 中多

用來形容群體、自我身份（15.5%）。而對「不正常」的高度認同與擁抱，既是該群體區隔他人的重要標準，更是他們將現實社會身份與網路虛擬身份切割開的工具。

文本 1：

A：爛就爛這個號，我的正常生活號別搞髒了

文本 2：

A：你女朋友知道你玩微博嗎

B：她知道我玩微博，但她不知道我玩這麼噁心。我正常生活（賬）號（粉絲中）有她。

文本 3：

A：管理（員）應該就我一個正常人

B：不能苟同

A：你們這群沒素質的差不多得了

C：你正常你媽逼，你拿你的號你問問你女朋友，你正常不正常，你敢嗎？

榮格心理學認為，人們都帶著人格面具（persona）保持「正常」，即依照主流社會價值體系進行表演，並將與社會價值體系不相容的內容壓抑到無意識之下。這一部分也被稱作陰影（shadow），主要由欺騙、辱罵等社會常識中負面的內容組成（河合隼雄，2009／李靜譯，2020，頁 123）。陰影是「正常」的對應面，也就是群內所言的「不正常」。隨著網路技術的發展，數位媒介與每個人的現實生活緊密聯繫。因此超話群成員不僅需要在現實生活中表演，在現實親友知曉的社交帳號中，在網路審查越加嚴格的網路環境中，他們也需要進行「正常」表演，並不斷積壓那些「不正常」的陰影。此時，微博超話作為虛擬趣緣導向社群平台，為該群體提供了得以凝聚的空間，需要正確回答問題才能加入的微博群則進一步提供了卸下人格面具的安全感。於是，他們越明白這些表達的「不正常」，就越熱衷於在網路中使用這些與「正常」鏡像對應的話語。這種對「不正常」的態度還能進一步篩選、同化內部，區隔外部。他們將群裏反思網路暴力的人稱為「底線怪」，加以

否定和驅逐。但他們不是放棄「正常」，他們只是堅持「爛」在這個隱匿的數位圈層之中就行，在該群體之外，離開這個用於發洩的微博帳號，他們依然會帶上人格面具成為「正常人」。除了洩憤式的仇恨言論，另一「不正常」的顯著例子是該群體頻繁使用的極具特色的話語。

表 1：部分被高頻使用的「抽象話」及其釋義

抽象話示例	釋義
給 🤪 爪巴	給老子（髒話中的「我」）爬（滾）
biss	必（須）死，衍生例為舔狗（放棄尊嚴追求異性）
你 🐶	同髒話「你媽的」
🌶️ 🤡 🗡️ 🐼 🍷	那是真牛逼（厲害）
nmsl	「你媽死了」的首字母
Hape	「hǎ pī」四川方言中的髒話，意同「傻逼」
在?KKP	意為「看看批（女性生殖器官）」
🐼 嗚	農民，指沒有文化、沒有見識的人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這些話語被他們稱為「抽象話」（見表 1），主要指那些夾雜了大量 emoji 表情、四川方言（孫笑川家鄉話）、諧音梗等幽默元素的網路用語，例如「帶（大）人」、「兔兔」（盲目愛國者）、「郭嘉」（國家）等。抽象話一方面使該群體可以繞過網路平台的關鍵字過濾系統，發佈大量不文明辭彙進行網路暴力。另一方面，這種解構原有語言秩序的內部暗語，凝聚了群體認同感，利於群體性網路暴力的實施。此外，微博平台主體是資訊分享的公共社交平台，給該群體提供了向外進行網路暴力的空間。於是，他們在各種社會新聞下留言，栽贓陷害他人，這種狂歡式的洩憤，在反串身份和文化暗語的雙重面具下不斷向外擴張。而當大量普通網友相信時，於他們而言就是成功戲弄主流、權威的勝利。於是，使用言論欺騙愚弄大眾，為大眾的憤怒、悲傷感到狂歡，逐漸成為了這個群體的主要活動和特徵。而相互攻擊、謾罵、毫無意義的重複、自我嘲諷、貶低的話語也充斥著整個超話群，並逐漸形成虛擬空間中不正常的「狂歡廣場」。

2、反對「主流」：篩選出的底層敘事

除了「不正常」，負面性自我表達是該群體更主要的身份表述內容（90.6%），這一特點與國外類似的厭女社群 incel（involuntary celibate，中譯為「非自願守貞者」）具有一致性。兩個厭女群體都打破了 Van Dijk（1995）提出的「我們 vs 他們」的正態身份模式（Scotto di Carlo, 2022）：他們排斥外群體，卻並不強調群體的積極特徵，反而通過貶低自我來凝聚團體。但超出現有網路厭女社群研究歸納的特徵在於，該群體的自我表述常包含鮮明的社會層級關係，代表性相關表述為「底層」。

文本 4：

A：草這個世界人和人的參差也太大了吧。只有死亡是公平的，爲什麼我是負二代。

B：我這輩子也就只能租房了

C：回老家吧

A：額家裏房子被銀行收啦 我爹欠了 300 個

D：噢，那趕緊脫離父子關係啊。免得債務轉移

E：噢，那趕緊脫離父子關係啊

F：噢，那趕緊脫離父子關係啊

A：額三年沒見過他了，現在我媽都是黑名單了。

A：下線了，隨便抱怨兩句

H：沒事 我前途也很渺茫 屬於是社會最底層裏的最底層
中專學歷 剛剛學校暑假 身上 100 都拿不出來 明天就去
面試打工魯

G：[抱] [抱]

由於該群體極其善於利用網路的虛擬性，且具有與現實生活中的「自我」分離的強烈欲望。所以即便是他們內部群體的交流，也並非完全真實。結合群內用戶的 ip 位址、個人微博主頁內容，也可發現並非所有群內成員都是廣義上的社會底層男性。但根據語料庫整理高頻詞可以確定的是，他們願意表述並將他們凝聚起來的形象依然是：「中國底層男性」。人們通過選擇性地省略或強調自傳性敘事，有意識、有

策略地建構自我身份（項蘊華，2009）。該群體正是通過篩選並積極表述有關底層的「真實」，頻繁使用「底層」、「低學歷」等貶低性的話語建構出了共有的「底層身份」。這種身份也成為他們區隔群體內外「我們」和「他們」的重要符號。

文本 5：

- A：希望能把大專以上學歷的群用戶都禁言
- B：希望能把大專以上學歷的群用戶都禁言
- C：希望能把大專以上學歷的群用戶都禁言
- D：希望能把大專以上學歷的群用戶都禁言
- E：希望能把大專以上學歷的群用戶都禁言
- F：希望能把大專以上學歷的群用戶都禁言
- G：希望能把大專以上學歷的群用戶都禁言

文本 6：

- A：出去玩才開車
- B：有錢人滾出去阿
- C：都滾！
- D：快！
- E：沒發包的富哥都滾
- F：把富哥都給踢了！
- G：把富哥給踢了！

正如「不正常」對「正常」的扭曲一樣，鏡像並不意味著對稱一致，而是錯位對應。「富」、「高學歷」等辭彙是「他們」的上層敘事，而將「我們」凝聚的是與之錯位、鏡像的「底層」。貶低性的階層敘事與情緒為何能夠凝聚該群體，需從話語生產的社會文化層，即中國語境層面分析溯源。貶低自我的話語，延續了該群體的前身（李贛和孫笑川的粉絲）創造的相關話語——「屌絲敘事」。「屌絲（男性陰毛）」本是用來貶低李毅論壇成員的稱謂，但這種嘲諷被他們轉化吸收為自己的語言，並圍繞該詞創造了一系列的「底層敘事」（李超民、李禮，2013）。20 世紀 90 年代，黨和國家的重點轉向經濟現代化，中國社會

快速轉型，資源重新配置的背景不斷有人被篩選和邊緣化至社會底層，從而衍生出了一個巨大的社會底層（孫立平，2003，頁 63）。而廣大民衆依然信奉毛澤東時代經濟平等的思想，由此產生了一種針對新興中產階級和富裕精英階層的不公感（Wu & Dong, 2019），底層則被賦予了一層無產階級的正義光輝。正如女性是被遮蔽的，沒有自我言說空間和語言的人群，這些「底層」或信心受挫自嘲為底層的人，面對主流話語也是「失語者」。他們需要自我敘事來抒發不公感，於是「自暴自棄」地創造出以「屌絲」為核心的符號體系和敘事類型，從「底層正義抗爭」的角度出發，戲謔、誇張地再現當代現實中中國社會新的階層分化（曹晉、徐婧，2015）。

與語料庫中大量通過「低學歷」相關表達來自述為底層的話語（40.3%）相呼應的是，「學歷」是當下中國階層篩選的主要標準之一。現實中的挫敗讓部分男性認為沒有什麼值得被認真對待，便轉向網路空間尋求認同感，積極挪用壓迫者具有貶低意味的語言，如「底層」、「鼠鼠」等進行自嘲，在解釋層面進行權力反轉。即通過自嘲式的表述，遊戲性顛覆現實社會中的身份體系（王佳鵬，2016）。早有學者指出，網路空間中的戲謔文化是當代中國文化複調的重要組成部分，釋放著嘲弄權威、犬儒式抗爭的創造性力量（楊國斌，2009／鄧燕華譯，2013，頁 98）。但通過整理分析該群體的話語，可以發現話語的抗爭性在逐漸減弱。就微博整體平台而言，近年來政治和社會話題在流行議題的占比從 75% 下降到 23%，娛樂話題占比則從 20% 上升到 48%（Jia & Han, 2020）。而平台依據國家要求制定的過濾系統、封禁機制等資訊又隱藏在黑箱之中，這使得國家治理進一步內化為更謹慎的自我審查（Meng, 2011）。群內大多數人回避抵抗性，追求戲謔性。因此如若最初的「屌絲」文化是一種亞文化風格的抵抗，那麼發展至今則更多地展現出一種後亞文化的色彩，即抵抗性漸被文化娛樂性、身份認同性淡化（閔翠娟，2019）。

抵抗性弱化後的戲謔話語，更為碎片化，卻更易傳播，並以其幽默性在網路中吸引越來越多的人使用、生產、傳播相關話語。這一過程在群體內部被稱為「引流」。此外，如上文所述，如今被「引流」進來的人並非全是現實社會意義上的底層，但他們在興趣層面認同被包裝為「正義抗爭」的洩憤式「底層話語」，並以此獲得「小圈子」內部的

快感、認同。於是在某種程度上，該群體的「底層身份」並非現實階級，而是用西川祐子所言的「戲仿」（西川祐子，1996；轉引自上野千鶴子，2021／鄒韻、薛梅譯，2022，頁 13）創造出來的文化身份。戲仿的特點之一是會對戲仿對象過度認同，而該群體對底層身份的擁抱，正是對複雜社會結構的過度簡化，對社會關係是二元對立階層關係的過度認同。「自嘲」而非「自認」為底層的言外之意，不是對弱者的認同與尊重，而是對無法成為所嚮往的上層的怨憤。而在中國特殊歷史文化和現有制度管控下，這種憤懣往往將性別作為發洩口（Wu & Dong, 2019）。群聊記錄中某條被重複發表的文本在一定程度上對這種機制做出了清晰的概括。

「我算搞明白這個逼群了，每天就是起床鍵（建）政，鍵（建）著鍵（建）著就他媽要潤（run：跑），逼逼一大堆發現也潤不出去就搞黃色聊以自慰，賢者時間（男性射精後的暫時性空虛感）了就互相攻擊尋求荷爾蒙刺激，時不時聊一下皮套（vtuber），來個女的大夥就都變成舔狗。」

（二）「她們」

由政治性話題轉向以情欲「聊以自慰」的具體表現是，群內充斥著大量分享女性身體的內容。「自信」在流行厭女和女性主義的鏡像框架裏是一場零和遊戲（Banet-Weiser, 2018, p. 109），厭女者往往對女性自信展露的身體表達侮辱性極高的性評價，相關內容在語料庫 2 中占比高達 95.1%。通過對語料庫文本的整理和分析，本研究認為厭女者在中國多重意識形態的影響下，主要採用了以下兩種厭女話語策略，評判、侮辱女性身體，建構相應的女性身份。

1、性化：以身體為重心扭曲女性主體性

文本 7：

A：[網上某個女性網友的自拍]

B：騷逼，想讓她給我乳膠（交）

文本 8：

- A：剛才地鐵看見一個女的，太漂亮了，我擦，決（絕）絕子（網路用詞）。想日，穿的吊帶，隱約看見乳溝，牛牛（生殖器）爆炸了。
- B：狠狠地透她
- C：瞭解下她是不是處女
- D：沒事的，尾隨她，她叫保安，你就可以說你就是保安
- E：安心，處女總要被人透沒呢，爲什麼不能是你呢

「騷」、「騷雞」、「繼（妓）女」（常爲幽默效果和躲避微博審查機制使用同音字「繼」）、「想操」等是討論中高頻出現的內容。男性網路厭女社群性客體化女性是普遍存在的現象，這一過程往往包含使用各自文化中的詈語，例如英文中的「bitch」（Moloney & Love, 2018; Scotto di Carlo, 2022）。該群體使用的辱女辭彙大多也來自中國傳統詈語。指向女性的詈語與她們的能力無關，而是關乎「三從四德」的品行。女性必須溫婉服從，性格剛烈的女子被罵爲「悍婦」；女性必須認同一夫多妻制度，反對丈夫納妾被斥爲「妒」；女性必須隱匿在閨房中，「拋頭露面」的女子大多免不了被貶爲「婊」；女性的性需求更應該是「見不得人」的，少女思春被罵爲「浪」，大膽展露性感的身體被呵爲「騷」，主動追求性愛則被辱爲「淫」。其中與「性」有關的詈語不僅辱女，更是一種用「性的二重標準」鼓勵男性，壓抑女性的規範（Jackson & Cram, 2003）。但結合上下文語境，可以發現群內對「騷」等詞的應用在當前語境下已成爲一種互文性的表達。辱罵，或者用群內的話表達爲「銳評」女性「騷」，重點不再是傳統意義上以貶損的方式讓女性回歸無性身份的規訓，而是對女性「性客體」身份的強調。照片是女性主動展示還是被群內人員偷拍，她是誰，這些都不重要。可愛或清純，正裝或泳衣，一切風格，一切造型，甚至一切女性身體部位，只要不違背主流審美便都是空洞的性感符號。而該厭女群體對詈語的使用爲何從規訓「品行」轉向性化「身體」，除借助網路匿名性宣洩性欲外，還涉及中國語境下多個權力主體、意識形態的複雜交織，共同使強調女性特質的身體敘事成爲焦點。

中國女性自信展露身體，對挑戰女性「去性別化」的早期國家性別

敘事具有重要意義。前人研究也指出，中國女性能通過發表自拍等照片，挑戰傳統的被客體化，享受愛自己的純粹快樂 (Chang, Ren, & Yang, 2018)。但這種以「愛你的身體」為主要表現的「女性自信」，不僅是流行女性主義的核心環節，更是當今中國「她經濟」崛起背景下重要的商業標籤。許多企業借女性主義進行商業宣傳，將「通過消費獲得身體美」包裝為「悅己」式的女性賦權。平台經濟更通過網路直播商品化女性身體，使其直接與經濟利益掛鉤 (劉瑀鈞, 2023)。於是平台、資本交織形成的數位消費文化，在弱化、扭曲女性主義政治性的同時，卻又進一步促使女性自信、女性身體成為商業社交媒體平台上的焦點。而作為焦點具有高可見的女性自信不僅被男性理解為對男性自信的閹割 (Banet-Weiser, 2018, p. 109)，在中國語境下更是對自貶為底層的厭女者的刺激。於是他們不僅需要引用傳統詈語否認女性的自信，更需要以話語暴力重申社會契約中的性契約，即用「想操」等佔有意極強的話語，強調男人高於女人，男人擁有女人身體的傳統秩序 (Pateman, 1988, p. 2)。國家話語則隱晦地助長了對這種傳統性別秩序的重申。為穩定社會和提升人口素質，自 2007 年起，中國婦聯便聯合新華網展開了浩浩蕩蕩的「剩女」媒體宣傳運動，呼籲女性，特別是年輕、高知女性回歸家庭 (洪理達, 2014 / 陳瑄譯, 2015, 頁 25-26)。近年來，這種保守的趨勢更隨著國家對儒家思想的公開接受而得到加強 (Wu & Dong, 2019)。於是中國年輕女性試圖主導的性別化身體敘事，更容易被反噬、扭曲為服務於男性凝視、國家生殖要求、商業宣傳。

文本 9：

A：(分享女性網紅圖片)

B：繼女，繼續當富哥們的玩具

「繼(妓)女」一詞則帶有更強的攻擊意味。改革開放後，中國女性形象從無性別轉向高度的性別化，市場化的代表意象從「鐵娘子」轉變為「青春飯」(Amy Hanser, 2005)。中國女性開始受到性化和商品化的雙重厭女規訓，「性感」成為了部分女性為數不多能夠實現階級躍遷的資本之一。部分女性更高調宣揚依靠「性」從異性戀關係中獲取

物質利益是一種女性賦權 (Wu & Dong, 2019)。於是女性因社會地位提升，從而能夠逃脫某些男性壓迫的情況，被執著於階級對立敘事的男性扭曲為「女性的不公分配」。使用「繼(妓)女」貶損女性的重點不在於傳統意義上的羞辱其放蕩，而是一方面強調女性只能用「性」換取上升機會，以偏概全否定所有女性的能力。另一方面否認那些利用「性」，逃離部分男性支配的女性自主性，強調她們只是更高階級男性的「消費品」。因此在群內對「繼(妓)女」的辱罵中，「富哥」常被調侃卻從不受審判。同時，在中國特殊歷史文化背景下對享有優渥資源女性的仇恨，還被包裝為對無產階級的愛，從而滿足厭女者的正義幻想。但實際上，他們對女性的貶損並不意味著捍衛社會主義的道德情操，只是在為被市場經濟削弱、瓦解的男性氣質權威鳴不平。(曹晉、徐婧、黃傲寒，2015)。

文本 10：

A：他媽的

B：操你媽的，你女朋友是個繼女，你帶(戴)綠帽

文本 11：

A：真般配，非要等到精液從逼裏流出來，你才善罷甘休嗎？

B：我能怎麼辦，我愛她啊

C：估計綠帽奴要看著母狗懷上別人的種才肯甘休

B：我離開她就要死了

E：到時候生個大黑胖小子

F：太痛了

E：[笑哈哈] [笑哈哈] [笑哈哈]

A：你嗎個逼還有這種龜男

同時，群體內部也通過侮辱性辭彙，要求男性遵守「支配女性身體」的傳統性別秩序。這類話語的使用大多是對傳統詈語文本、規則的直接引用。詈語普遍地存在於不同的人類社會中，並存在著某種共性——明顯的性別差異，即往往通過貶損女性達成冒犯、侮辱他人的效果(蔡雨坤，2016)。在中國沿襲父權封建私有財產制的時期，女人一度只是作為男性氏族家庭的私有財產存在，其貞潔是維持氏族資產

傳承、家族名聲清白的重要組成部分（周華山，1999，頁 189）。因此言語冒犯或貶損女人的「性」，其實際目的是在父權社會的背景下侮辱其男性伴侶或親屬。例如群內高頻使用魯迅（1925/2005，頁 245）所言的中國國罵——「他媽的」。此類傳統厭女話語，體現出使用者對「女性不具備社會身份資格」的默認，女性對於他們而言只是維繫男性關係的條件（Rubin, 1975, pp. 157-210），是用於泄欲的、可交換的所有物，而非一個獨立自主的人。而男性未能完整支配他的女性所有物則是一種恥辱。在對男性進行羞辱時，他們常假設其他男性，尤其是其他種族（「黑人」在該群體的使用中是一個較為頻繁的例子）男性對女性伴侶的性侵佔。常用的貶損詞為傳統詈語中妻子與人通姦的男子之代稱——「綠帽」。而如果有男性表達了對女性除性欲望以外的情感或欲望，比如愛，那這樣的人將被貶損為懦弱可笑的「龜男」。

2、非人化：主流男性審美霸凌

由此，該群體通過性化女性建立男性主體，並維繫傳統的男人紐帶，這正是厭女的重要環節（上野千鶴子，2018／王蘭譯，2023，頁 18-26）。但本研究還想進一步強調，該群體高度性化女性是在多重意識形態交織的背景下，對中國流行女性主義的反噬，並給當代中國女性帶來了新的厭女困境。當今中國女權意識逐漸覺醒的年輕女性既拒絕成為無性的「鐵娘子」，又時刻自審警惕是否會成為迎合男性欲望的客體。前人厭女研究中的「聖母與娼妓身份二分且互相嫌惡」（上野千鶴子，2018／王蘭譯，2023，頁 34-38）不再適用，「媚男」與否成為新時代中國女性內部嫌惡的新標準。於是在高度性化女性的背景下，最簡單的反抗似乎是拒絕現有主流審美。這也是女性主義運動的意義，不僅僅是鼓勵符合「主流審美」的女性愛自己，更呼籲所有女性挑戰既定的容貌規範。女性能夠通過媒介「逆向再現」建立起具有對抗性和區隔性的身體審美標準，以改變不對稱的男女位置關係（曾麗紅、葉丹盈、李萍，2021）。但需要警惕的是，在新自由主義強調「個人」的背景下，這種能動性最終落腳到個體上。不管傳統文化告訴我們應該多憎恨自己的身體，愛護自己的身體是每個女性的責任。這是一項個人成就，而不是對結構性性別不對稱的認識。此外，在這一過程中，如果沒有那麼「自信」，便會更容易感到羞恥（Banet-Weiser, 2018,

pp. 65-91)。而在女性進退維谷的情況下，厭女者則能輕易引用、創造詈語，建構「應該自我羞恥」的女性形象，描述和規訓那些不符合傳統審美規範的身體。

文本 12：

- A：一幫母狗，醜 b，還迷之自信
- C：不能慣著。大唧唧抽她們臉
- D：把他們操了。你出手還拿不下他們？
- E：這種女性真不配活在這個世界上
- A：母狗醜 b 給狗都不操

中國傳統人本觀念強調物賤人貴，詈語中存在大量「非人」類的侮辱，例如「母狗」、「草包」等。而厭女者強調女性唯一的價值是作為男性的性工具，因此無法符合男性審美便「非人」。除了引用傳統詈語，他們也創造出新的辱女詞，例如用「坦克」一詞對女性進行肥胖羞辱。該詞是性化女性和主流審美霸凌的雙重產物，因為厭女者最初是引用「按 F 鍵進入坦克」這一電子遊戲用語，來暗指與不符合傳統審美的胖女人發生關係，從而貶損嘲笑其他男性。需要注意的是，這樣的羞辱並不只出現在群內討論中，而是成為男性群體文化的一部分被傳播出去。他們所創造出的「坦克」等詞不僅出現在群內，也正在被群外男性用以侮辱女性。據《陝西都市快報》（2020 年 6 月 23 日），西安一高校男生直播偷拍，公然侮辱兩名女生為「坦克」。超話、甚至微博平台內外的厭女者依靠共用辱女話語、思想，已形成鬆散卻龐大的厭女聯盟。此外，具有網路行動傳統的他們，還會有計畫地針對那些提倡女性自我賦權的女性博主，進行組織性的攻擊。例如針對博主黃芳莉宣導多元審美的視頻，對她本人進行網路暴力。⁵

由此，依據上文所述可做一定的總結。在男性危機、市場經濟、國家話語多個意識形態的交織下，厭女者既延續傳統侮辱，又積極創造新的詈語，分別構建出「底層的我們」和「低賤的她們」，形成一對鏡像身份。而在話語和被構建的身份背後，他們更依靠共用傳統性別秩序的核心思想鬆散連接，與網路空間中的其他厭女者，在面對性別議題時形成某種模糊的「利益集團聯盟」（Ging, 2019）。

二、鏡像話語行動

(一) 話語的再鏡像：「國蝨」與「蝨女」

線上話語行動成爲第四波女性主義浪潮的主要模式，與話語權力間的關係密切相關。Foucault (1976/余碧平譯, 2016, 頁 85) 提出，「話語和權力具有一種複雜的不穩定的相互作用，其中話語可以成爲一種妨礙，一種絆阻，一個抗拒和反對策略的起點」。話語是不穩定的，並暗含著解構與重構的空間。Chris Weedon (1987/白曉紅譯, 1994, 頁 127-132) 將這一理論吸收並用於女性主義文化實踐中，提出「倒置話語」能使話語中受制的主體爲她自己發聲，即作爲第二性的女性能夠重新評價，並反轉被主流話語貶抑的話語、知識、主體，來達到顛覆主流話語的目的。「倒置話語」在 Womad 等韓國激進女性主義網路社區中被充分應用，並被她們稱爲鏡像策略。該策略呼籲女性將仇恨、規訓、貶損女性的言論和辭彙進行性別鏡像反轉創造，用以攻擊男性 (Moon et al., 2023)。近年來，這種策略也被中國的年輕女性們廣泛接受和積極使用。例如，她們會積極使用「他爹的」來替換常見冒語「他媽的」，以避免侮辱女性；將「極端女權」反轉成爲「極端男權」，以反擊對女性汙名化的判斷與定義。她們還依照父權體系的價值判斷，模仿男性粗俗和具有攻擊性的語創造出「國蝨」、「小屌（男性生殖器官）子」等辭彙貶低男性。這些話語偏離了傳統意義上的女性語言、女性觀點和某種「被允許的女性主義」，是對傳統性別規範的突破。而女性話語行動的高可見，也使得越來越多的人能夠知曉這類詞，群內甚至也能見到相關表達。

文本 13：

- A：醜 b 啤酒肚蝨藍能不能死一死
- B：醜 b 啤酒肚蝨藍能不能死一死
- C：醜 b 啤酒肚蝨藍能不能死一死
- D：醜 b 啤酒肚蝨藍能不能死一死
- F：[笑哈哈] [笑哈哈] [笑哈哈]

文本 14：

- A：哈哈你這有點兒癩了
B：[笑哈哈] [笑哈哈] [笑哈哈]
C：真癩在這，我只能一般癩
D：[笑哈哈]

但根據文本可發現，群內男性對待這類詞語，部分遵循了其群體慣有的文化邏輯，挪用他人的貶損性稱呼（例如「屌絲」）用以自嘲，用幽默化解其中的攻擊性和貶損性。女性的鏡像話語難以達成目的，也與話語權力關係的複雜性有關。儘管權力關係基本上是流變的、可推翻的，但它們通常的特徵是，能夠通過各種制度而逐漸穩定，這意味著話語流動是有限的。辱女話語是厭女這一歷史性壓迫機制的具體表現之一，由父權社會背景下的各種資源支撐。壓迫女性的權力處於 Foucault 所言的「支配狀態」，而非「策略關係」（Fornet-Betancourt, Becker, Gomez-Müller, & Gauthier, 1987）。同時，權力非武力、無強制性，權力吸引、拉攏、誘惑、贏得贊同，而不能被設想為一個群體獨佔權力，用自上而下的單純把權力向下輻射到一個從屬的群體（Hall, 1997／徐亮、陸興華譯，2003，頁 264）。但鏡像話語正是對父權「自上而下」邏輯的模仿，如果厭女者「戲仿」（西川祐子，1996；轉引自上野千鶴子，2021／鄒韻、薛梅譯，2022，頁 13）底層身份，女性則是在「戲仿」父權話語，並過度認同父權話語的霸權邏輯。因此鏡像話語揭露父權並對之做出反擊，卻難以拆解父權結構。

文本 15：

- A：癩女嘛是這樣的
B：癩女會不會去遊行啊？
C：女的都是網路巨人 [笑哈哈]

同時，群內男性還以此為樣本，對應創作出了「癩（昆蟲）女」等詞，再次鏡像女性的鏡像話語。「癩女」和「國螞」等攻擊性話語，彼此鏡像並糾纏，它們既釋放壓抑達成宣洩，卻又造成另一方的壓抑引發新的反抗，刺激女性與男性群體永遠進行鏡像式的話語創造和鬥爭。而這種在中文網路上具有高可見性的話語行動，正浪潮一般地吸引越

來越多人參與到造詞活動中，使本應成爲焦點的父權結構逐漸隱身。

(二) 情緒的鏡像：憤怒與樂子

憤怒、情緒性，既是流行女性主義的重要主題之一，也是當下數位女性運動的重要主題。情感不僅能凝聚女性，數位敘事的情感力量所塑造的新的可見性，對於瓦解和重新配置性別化的權力結構至關重要 (Mendes et al., 2019)。女性鏡像話語創作亦是源於對歧視、侮辱女性的憤怒情感。近年來，越來越多女性在微博上積極發聲，表達並號召憤怒，可正如上文分析，「憤怒」等情感正是該「底層」群體最樂於愚弄的目標。女性越憤怒、嚴肅地對待性別議題，他們就越樂於將女性作爲釣魚的目標，例如李贛事件。⁶爲了更好展示「憤怒」被如何鏡像爲「樂子」，本研究重點聚焦群成員對「唐山打人案」這一極端性別暴力事件的討論。通過整理分析聊天記錄，本文認爲他們所進行的話語行動具有以下三個特徵。

1、反應性

「唐山打人案」事件一經曝出，就引發大量網友關注，在微博上傳播速度的峰值達到每小時 18,245 條 (知微事見，2022 年 6 月 10 日)。但在該群中引發討論的並不是新聞事件本身，而是一位女性群成員在看到該事件時發表的感想。

文本 16：

A (女性)：看得我都想殺人了，全他媽捅死。

B：[笑哈哈]

C：[笑哈哈]

D：[笑哈哈]

E：母狗等會急完了

A (女性)：這還釣魚，這還釣魚不狠狠罵你 [怒]

F：女性蛆滾出去

B：微博母狗司馬 (死媽) 了，蠅男基本盤又爛了

G：微博母狗司馬 (死媽) 了，蠅男基本盤又爛了

文本 17：

- A：我朋友圈全是，微商都看不到了，現在還在罵遠離男人，
男人下頭
- B：這種母狗就是整天只會酸 q 啦暴風吸入決絕子 [笑哈哈]
[笑哈哈] [笑哈哈]
- C：你朋友圈爲什麼有這麼多女拳你是不是該反思一下

文本 18：

- A：不是我不想聲援我國女性，是她們先惡意對我們男性
- B：其實也沒那麼複雜 很多智力問題最後都被繞成了性別問題
- C：女拳是這樣的，除了重拳出擊跟智商沾邊的事一點不幹了

截止事件熱度趨於平緩的日期（以輿情報告的 18 天爲週期），群內幾乎沒有人轉發新聞報導或是對事件的深入分析，在群裏激發他們有所反應，熱烈討論的是女性在該事件中情緒化的表達。而他們的表達也與這類女性表達呈現出鏡像式的對應。唐山事件作爲針對女性的惡性事件，會觸發女性的不安和憂慮感等消極情緒。而某些發洩式的內容，能喚起女性更積極、更強烈的情感——「憤怒」和「團結感」——來抑制消極情緒的影響。「正義的憤怒」(righteous anger) 也成爲發聲抗爭得以維持的情感動力（馮劍俠，2019）。但身爲男性很難理解女性之間集體性的不安，更難對此產生共情。於是在群聊轉述中，他們著重強調女性表達的情緒化、非理性，用「罵男人」、「厭男」等詞句將女性的表達簡化概括，更用「拳」代替「女權」，強調女性主義者的攻擊性、「虛假性」。早有學者將男性對女性主義的呈現概括爲經典的「傑基爾和海德」，但在中國的輿論場上並非是與「傑基爾」和「海德」、「好」與「壞」的對立，而是「真」與「偽」的對立（甘麗華，2021）。作爲當代男性，大多數中國年輕厭女者體認「性別平等」，並基於國族主導女性主義的發展歷程，認爲中國已經達成男女平等的目標。因此對他們而言，符合男性、國族敘事的女性主義者才爲「真」。而那些試圖質疑並威脅到這一框架，提出「女性權力」的女性，則是應該被警惕和排斥的，冷酷、自私、貪財的「偽女權」、「田園女權」、「女拳」（Wu & Dong, 2019）。這樣的男性主導定義模糊且遮蓋了「性別平等」的真

正內涵，而這些具有明顯侮辱性的定義詞，也不斷引發女性的不滿。於是，情緒喚醒並激發情緒，「憤怒」在女性和厭女者兩個群體之間不斷彼此鏡像、互相刺激。

情緒，同樣是一種被篩選出的展現。針對唐山事件，微博官方宣佈對散佈「有害言論」的用戶採取零容忍政策。四十八小時內，該平台刪除了超一萬四千條帖子，暫封了八千用戶，並永久封禁了另外一千名用戶。「有害言論」包括因敏感詞而被判定為「攻擊國家政策和政治制度」或「煽動性別衝突」的評論，但敏感詞庫從未完整地公佈於眾。女性主義者對該事件的討論，往往會因為包含難以避免，甚至不知如何避免的敏感詞而被刪除，剩下的除了通報等官方資訊，便只是公眾同情的表達 (Zhang, 2022, August 29)。當前意識形態對任何可能挑戰其權威的行動和話語都保持著高度警惕，使作為政治活動的中國數位女性主義運動一直面臨著被壓制、審查、封禁的障礙。官方媒體甚至將僅是質疑報導忽視勞動婦女歷史貢獻的評論，粗暴地定義為「極端」、「毒瘤」(Bao, 2023)。這在消解女性主義影響力的同時，進一步為網路厭女者提供「合法合規」的材料。於是微博平台對於性別議題的討論很難深入到社會結構層面，能夠被大規模展現的「憤怒」，也往往是那些基於特定事件情緒化的狂熱，而非具有政治性的憤怒。群內男性大多關注、強調女性「厭男」話語的攻擊性，卻又忽視字面上與「厭女」呼應的「厭男」，僅是一種即時的易消散的應激性反應，而非持續的、結構性的，對某一性別權力的排斥和壓迫。在某種意義上，甚至能用群內厭女者的一句話來概括「今天朋友圈所有女的都厭男，明天就都忘記了」。

2、遊戲化

文本 19：

- A：女性越激進 我釣到魚越多！
- B：這裏是微博 女拳窩！不釣女性幹 j b 呢
- C：還放黃姐的郵箱，太搞了 [笑哈哈]
- B：還是女 id 勾引女性 好玩 看他們狗咬狗的樣子
- D：節目效果拉滿
- E：你真牛逼了氣死這群母狗

文本 20：

A：我 13 萬流覽量了

B：你 13 萬有什麼用？你又收不到米

C：帶明星哇 [笑哈哈]

A：你怎麼知道我收不到米（錢）

C：那你給我勻點

該群還將厭女實踐娛樂遊戲化。他們通過「再辭彙化」的話語策略，「遊戲化」網路釣魚行動，追求並收穫遊戲獎勵——「樂子」以獲得刺激感。遊戲任務是欺騙並惹怒網友，被稱為「團」；遊戲化身是他們虛構的反串身份，被概括為「釣魚身份」；遊戲攻略是群內分享的各類陰陽怪氣的言論，被定義為「文案」；微博平台提供的可見性以及可見性經濟的運作，則是遊戲排行榜，根據閱讀量、點贊、評論，獲得網友廣泛關注的人被稱為「帶（大）明星」。「遊戲化」能夠喚起用戶的遊戲體驗感，並刺激用戶參與其中（Hamari, Koivisto, & Sarsa, 2014），這也是中國厭女實踐能流行的原因之一。

這還是一場平台催化的「厭女遊戲」。首先微博的廣告推廣機制，⁷即對高閱讀量的用戶有一定的金錢獎勵，給這場遊戲提供了除情緒獎勵之外真正的物質獎勵，這在群內被稱為「米（錢）」。其次，群內部分成員不僅通過諧音等方式對詞語改造，避免審核刪除，更利用微博推廣認證體系成為認證的金 V，⁸即那些被微博鼓勵並推廣創作內容的用戶。而政府作為微博多邊市場重要客戶和監管機構的雙重身份，使該平台在為女性主義者發聲提供更多的空間的同時，也必須消除或減輕可能跨越國家「紅線」的社會話題的影響（Liao, 2023），例如警惕政治性女性主義內容的傳播。於是，平台通過不對等的推廣和治理，在無形中放大並促進了厭女症的蔓延。

遊戲之中，該群體唯一在乎的便是沉浸於玩（play），從而忽視這場惡性網路攻擊行為的危險性，更無視女性運動的嚴肅與政治性。而當女性的憤怒被置換為「樂子」，當對社會結構性問題的質疑與批判被層層審查過濾，僅存的那些女性話語便也只是飄蕩在這遊戲化的數位空間裏，它們被產出，被轉發，被標注著閱讀量，它們可見，卻也只停留在可見。

3、延續性

文本 21：

- A：奧斯維辛（太空人雅集之前的超話）的老朋友了
B：再沖一次黃芳莉吧 我看不下去了
C：[笑哈哈] 你不會覺得我們真能沖到什麼吧
D：[笑哈哈]
E：[笑哈哈]
C：現在超話連個賣批的繼女都拿不下
F：不是，你們拿下過什麼，什麼叫現在？帶帶時期（帶帶大師兄：孫笑川）我也沒看你們怎麼樣啊。
E：[笑哈哈] 我的評價是不如批小將（視頻網站嗶哩嗶哩的粉絲）
G：甘某是帶帶時期還是吉普賽時期來著
H：觀察網超話不是拿下過一次嗎

文本 22：

- A：爲曉芸橙汁兒，實名餘雷，武漢人，武昌理工學院文法系和外語系畢業，紐賓凱漢街匡際社區 8 棟 1 單元。喜歡男扮女是吧，怎麼不硬氣了呢？（複製）
B：兩年前釣女拳文案，經典
C：我釣魚都用的劉鵬

文本 23：

- A：這次鬧這麼大啊
B：炸！炸個痛快
C：先把新家找好
D：新家圈我
E：新家圈我

在該群體圍繞唐山事件進行網路「釣魚」時，他們還經常提起兩類詞和短句，一是「xx 時期」、「上次」、「現在」等描述時間的詞。在此類話語中，原本很難感知的時間有了方向和形狀，它串聯著那些事件

形成了由過去向現在和未來延伸的歷史。「上次」、「帶帶時期」如同時鐘和日曆，在滴答的鐘聲裏，該群體形成了某種程度上的共同體，他們不一定與每一個個體相識，卻能確信「我們」穿越了同一個「同質的、空洞的時間」(Anderson, 1983／吳叡人譯，2016，頁 23)，我們是一個「共同體」。第二類是「黃姐」、「李贛」、「孫笑川」、「餘雷」等他們網暴過的人的名字。這些名字不僅成爲了他們下一次釣魚的文案，更成爲了將該群體彼此聯繫、凝聚的文化符號。

作爲一個宣揚「底層正義」具有攻擊性的組織，該群體的微博超話常被封禁。所以他們靈活地創建了大量超話，隨時準備轉移（本研究關注的微博超話：「太空人雅集」於 2022 年 10 月 27 日被封禁，相應群也被解散，但又在解封後建立了新的群：「太空人之家謹言慎行」）。他們經常互相評論「負（互）關」，互相關注建立超話群、超話外的聯繫，彼此互幫互助前往下一個數位據點，下一個共同的「家」。將他們聯繫的不是某個具體的空間，而是以抽象話爲主的特殊話語、文化及其相關衍生物，共同形成的共時性的時間感知。於是即使他們在網路空間的據點不斷被銷毀，卻又可以迅速重建、崛起，然後醞釀下一次變本加厲的集體狂歡式攻擊。

伍、結語

截止 2022 年 9 月，新浪微博月活躍用戶數達 5.84 億（吳雨欣，2022 年 11 月 17 日）。作爲中國最大的媒體社交平台，微博在一定程度上給予女性進行話語行動的空間。但在肯定女性網路行動積極性的同時，也要警惕近年來網路頻發的辱女、厭女事件，從而意識到數位空間是一個不穩定的多元主體權力角力空間。爲了更好描述這種空間，本文引入了 Banet-Weiser（2018）提出的「流行女性主義和流行厭女的鏡像關係」理論框架，採用話語分析的研究方法，對「太空人雅集」微博超話群的厭女現象爲例做出考察和分析。研究發現，流行厭女和流行女性主義之間「funhouse mirror」式的動態鏡像關係（Banet-

Weiser, 2018) 在中國同樣成立。中國女性利用網路話語行動自我賦權的同時，會刺激和加重部分群體的厭女情緒，雙方的表達、信心、情感不斷被相互鏡像扭曲、反噬。但基於下列新發現，本研究認為中國語境下的「厭女和女性主義」並不能被「funhouse mirror」這一隱喻簡單概括。

首先，中國網路厭女實踐，不只對女性主義做出鏡像反應。中國網路厭女者所建構的男／女網路身份和話語，不僅鏡像扭曲女性主義的表達，還曲解和混淆著現實與虛擬、正常與異常、主流與底層、快樂與傷害、政治與情緒。而這些鏡像反應本身，也以文化的形式折射出中國現實社會轉型過程中，階層與社會性別秩序的動態景象，因此極易促使男性之間「惺惺相惜」，形成廣泛的反女性主義政治、文化團結。其次，中國網路厭女所處的數位空間極其複雜。中國主流商業媒體平台是一個受到國家嚴格管控，相對封閉，存在不對等推廣與治理的網路生態系統。同時，社交媒體的低門檻、廣覆蓋，使其成為多個意識形態交織、鬥爭的文化空間。這意味著某種女性主義或厭女的高可見式流行，並不由西方相關研究集中批判的市場經濟主導，而往往是多個意識形態和權力主體博弈後的暫時性結果。

這些極具中國特色的發現提醒我們，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背景下，厭女研究、性別研究依然需要將全球宏觀政治經濟與地方微觀政治文化情境相結合，進行在地化的分析。基於這樣的視角，本研究試在中國語境下，進一步發展「funhouse mirror」這一理論概念。在此地，受到流行女性主義刺激的厭女者，不僅曲解存在系統性性別歧視的社會現實，使其社交媒體再現利於厭女實踐，從而應對男性氣質危機。而是能夠在數位空間中，有意或無意地與某些權力主體、意識形態形成或暫時或長期的合謀，從而不斷建構出更為微妙、「正確」的性別壓迫機制。由此，中國厭女者建構出的不只是荒唐的鏡像屋，而是一座抑制女性主義政治潛力的「鏡城」。國家政權、傳統文化、階級、資本等要素鏡鏡相映，形成幻影幢幢的歧路。女性主義者身在其中，則不斷混淆和模糊每一次的反抗與順從，突圍與陷落。換言之，在目前的中國數位空間中，厭女更容易獲得助力，女性主義則更容易遭受反噬。因此需要不斷警惕和抵制新厭女形式的生成，並在研究女性具體性別實踐時，脫離「賦權」還是「祛權」的二分簡單判定框架。

此外，儘管本研究較為創新地關注了具體的中國厭女者網路社群，並試圖對應中國數位女性主義對其作出分析。但相關結論僅是基於微博平台作出的分析，也缺乏網路民族志的互動觀察和微觀層面的深度訪談，未來研究或許可以針對該群體在論壇（重要據點）、QQ 群等社交媒體中的數位社群進行調研。以期結合多平台現象，個體具體資訊、經歷和心理機制，對該群體做出更全面的闡釋。同時，「鏡城」作為一個強調多元主體間彼此折射、反應的概念，後續研究亦應從女性主義者、國家話語、商業平台等角度出發，以這些主體的反應作為研究對象，從而彼此對應，完善這一理論概念。

註釋

- 1 攻擊宣導多元審美的女性博主黃芳莉以及呼籲打破審美大碼穿搭博主辣條小王子等人。
- 2 據群內消息和其他報導，該群體部分成員曾參與相關網路群，在中國男偶像吳亦凡因性犯罪被捕時，扮演聲稱「要劫獄救哥哥」的女性粉絲，並將這一話題炒到微博熱搜榜首，閱讀量過億。請參閱：<https://view.inews.qq.com/a/20210811A05WXX00>
- 3 楊笠，中國女脫口秀演員，因在表演中調侃男性「為什麼明明看起來這麼普通，但是他卻可以那麼自信」引發爭議。
- 4 2022 年 6 月 10 日凌晨 2 點 40 分許，河北省唐山市公安局路北區分局機場路派出所轄區某燒烤店，某男性搭訕不成，暴力毆打女性至重傷，後逃逸。
- 5 2021 年 11 月 29 日，微博用戶@大家早中晚上好啊在超話發帖，暗嘲博主@ONLee 黃芳莉（微博粉絲 169.4 萬）發佈於 2020 年 8 月 23 日，呼籲多元審美的視頻。帖子發出後，狗粉絲開始對博主進行組織性、反串式的網暴。詳見視頻：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sm4y1X7Tw/?spm_id_from=333.999.0.0&vd_source=633245c9a44f184c9a7acb7d2b2dfbef

- 6 該群體曾將李贛在微博上發佈的女兒的相關資訊，惡意解讀編造為「騙取流量」。並反串、偽裝成女性主義者，對該內容進行廣泛宣傳，甚至矇騙某知名女性自媒體（橙雨傘）發佈了指責李贛虐待女兒的內容，引發眾多網友關注、斥責，「李老八」甚至成為了微博熱搜。當李贛慌忙解釋時，眾多網友憤慨甚至網暴李贛時，該群體則在小圈子內部歡呼，這又是一次成功的「團」。
- 7 微博創作者廣告共用計畫介紹。請參閱：<https://kefu.weibo.com/faqdetail?id=20760>
- 8 微博金 V 認證體系簡介。請參閱：<https://kefu.weibo.com/faqdetail?id=20201>

參考書目

- QuestMobile 研究院 (2023 年 3 月 7 日)。〈2023 年「她經濟」洞察報告：女性活躍用戶近 6 億，消費意願、消費能力遠高於男性，三大趨勢凸顯「價值」躍遷〉。取自 QuestMobile 網頁 <https://www.questmobile.com.cn/research/report/1632941902704775169>
- 〈西安財經大學男生直播搭訕並侮辱女生 當事人手寫道歉信〉 (2020 年 6 月 23 日)。《陝西都市快報》。取自 https://view.inews.qq.com/k/XAC2020062300903200?web_channel=wap&openApp=false
- 〈百度孫笑川吧被指有大量侮辱女性帖文，貼吧：全面清查〉 (2023 年 3 月 23 日)。《澎湃新聞》。取自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61158429570236659&wfr=spider&for=pc>
- 〈「狗粉絲」背後的新型網路暴力亟需遏制〉 (2018 年 8 月 28 日)。《光明日報》。取自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10002861680678875&wfr=spider&for=pc>
- 〈「唐山一燒烤店內多名男子毆打女生」輿情報告〉 (2022 年 6 月 10 日)。取自知微事見輿情監控網站 <https://ef.zhiweidata.com/event/b2c294484ee09e4510065969/trend>
- 王佳鵬 (2016)。〈在狂歡感受與僵化結構之間——從網路流行語看網路青年的社會境遇與社會心態〉，《中國青年研究》，16 (04)：83-89+47。
- 王政、高彥麗、劉禾 (2005)。〈《從女界鐘》到「男界鐘」：男性主體、國族主義與現代性〉，王政、陳雁編《百年中國女性思潮研究》，頁 1-29。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 王蘭譯 (2023)。《厭女：日本的女性嫌惡》。上海：光啓書局。(原書 上野千鶴子 [2018]. 《女ぎらい》。日本東京：朝日新聞出版)
- 白曉紅譯 (1994)。《女性主義實踐與後結構主義理論》。臺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原書 Weedon, C. [1987]. *Feminist practice and poststructuralist theory*. Oxford, UK: Blackwell.)
- 甘麗華 (2021)。〈父權制、網路厭女與女性主義的中國化詮釋〉，《傳播與社會學刊》，57：159-190。
- 余碧平譯 (2016)。《性經驗史 (第 1 卷)：認知的意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原書 Foucault, M. [1976]. *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 Vol.1 La Volonté de Savoir de*. Paris, France: Éditions Gallimard.)
- 吳雨欣 (2022 年 11 月 17 日)。〈微博三季度營收降兩成：日活用戶 2.53 億，廣告投放環比恢復〉，《澎湃新聞》。取自 <https://m.thepaper.cn/>

newsDetail_forward_20777510

- 吳叡人譯 (2016)。《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原書 Anderson, B. [1983].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UK: Verso.)
- 李超民、李禮 (2013)。〈「屌絲」現象的後現代話語檢視〉，《中國青年研究》，13 (01)：13-16、69。
- 李靜譯 (2020)。《榮格心理學入門》。上海：東方出版中心。(原書 河合隼雄[2009]. 《ユング心理學入門》。日本東京：岩波現代文庫)
- 周華山 (1999)。《閱讀性別》。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 孫立平 (2003)。《斷裂：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的中國社會》。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陳祖洲、梁玉國、劉金源、劉光華、王海波、王勇、……嚴幸智譯 (2001)。《二十世紀史》。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原書 Bulliet, R. W. (Eds.). [2000]. *The Columbia history of the 20th century*.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陳瑄譯 (2015)。《中國剩女：性別歧視與財富分配不均的權力遊戲》。臺北：八旗文化。(原書 洪理達 Fincher, L. H. [2014]. *Leftover women: The resurgence of gender inequality in China*. London, UK: Zed Book)
- 徐亮、陸興華譯 (2003)。《表徵：文化表像與意指實踐》。北京：商務印書館。(原書 Hall, S. (Ed.). [1997]. *Representation: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 London, UK: Sage Publications & Open University.)
- 常江、金兼斌 (2018)。〈米兔運動、介入式文化研究與知識份子的社會責任——《全球傳媒學刊》對話常江副教授〉，《全球傳媒學刊》，18 (03)：73-82。
- 曹晉、代詩眸 (2022)。〈「賦權」抑或「負權」：傳播新科技與社會性別權力關係的建構研究〉，《新聞與寫作》，461：5-17。
- 曹晉、徐婧 (2015)。〈網路新修辭與轉型中國的性別秩序重塑及階層關係重構——以「屌絲」為例〉，《當代傳播》，15 (05)：26-31。
- 曹晉、徐婧、黃傲寒 (2015)。〈新媒體、新修辭與轉型中國的性別政治、階級關係：「以綠茶婊」為例〉，《新聞大學》，15 (02)：50-59。
- 閻翠娟 (2019)。〈從「亞文化」到「後亞文化」：青年亞文化研究範式的嬗變與轉換〉，《雲南社會科學》，19 (04)：178-184+188。
- 馮劍俠 (2019)。〈「發聲」作為一種抗爭：#MeToo 運動中的情感勞動〉，《新聞界》，19 (10)：61-71。
- 馮劍俠 (2020)。〈#看見女性勞動者#：新冠疫情中的女性自媒體與話語

- 行動主義》，《新聞記者》，20（10）：32-44。
- 曾麗紅、葉丹盈、李萍（2021）。〈社會化媒介賦權語境下女性「能動」的「可見性」——兼對 B 站美妝視頻社區的「可供性」考察〉，《新聞記者》，21（09）：86-96。
- 鄒韻、薛梅譯（2022）。《爲了活下去的思想》。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原書 上野千鶴子 [2021]. 《生き延びるための思想》。日本東京：岩波書店。）
- 項蘊華（2009）。〈身份建構研究綜述〉，《社會科學研究》，9（5）：188-192。
- 鄧燕華譯（2013）。《連線力：中國線民在行動》。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原書 楊國斌 [2009]. *The power of the internet in China: Citizen activism online*.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魯迅（1925/2005）。《魯迅全集 第 1 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 蔡雨坤（2016）。〈關於髒話性別差異的再思考〉，《新聞界》，16（16）：16-21。
- 劉瑀鈺（2023）。〈身體圈禁：社交媒體環境下青年女性的負面身體意象生成〉，《中國青年研究》，23（05）：103-110。
- 戴錦華（2018）。《隱形書寫：90 年代中國文化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魏開瓊（2015/2022）。〈女性主義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與反省〉，顧燕翎編《女性主義經典選讀：重要著作選譯與評介 51 編》，頁 408-412。臺北：貓頭鷹。
- 西川祐子（1996 年 7 月）。〈書評 オリヴィエ・ブラン著，辻村みよ子訳《女の人権宣言--フランス革命とオランプ・ドゥ・ゲージュの生涯》〉，《文学》，7(3)，158-160。
- Baer, H. (2016). Redoing feminism: Digital activism, body politics, and neoliberalism. *Feminist media studies*, 16(1), 17-34.
- Banet-Weiser, S. (2018). *Empowered: Popular feminism and popular misogyny*. London & Durham, UK: Duke University Press.
- Bao, K. (2023). When feminists became 'extremists': A corpus-based study of representations of feminism on Weibo. *Discourse & Communication*, 17(5), 590-612.
- Baym, N. K. (2010). *Personal connections in the digital age*. Cambridge, UK: Polity
- Billioud, S. (2007). Confucianism, "cultural tradition" and official discourses in China at the start of the new century. *China Perspectives*, (2007/3), 49-65.

- Chang, J., Ren, H., & Yang, Q. (2018). A virtual gender asylum? The social media profile picture, young Chinese women's self-empowerment, and the emergence of a Chinese digital feminis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21(3), 325-340.
- Fairclough, N. (1992).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 Fincher, L. H. (2016). China's feminist five. *Dissent*, 63(4), 84-90.
- Fornet-Betancourt, R., Becker, H., Gomez-Müller, A., & Gauthier, J. D. (1987). The ethic of care for the self as a practice of freedom: An interview with Michel Foucault on January 20, 1984. *Philosophy & Social Criticism*, 12(2-3), 112-131.
- Gilmore, D. D. (2010). *Misogyny: The male malady*. Philadelphia, P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Ging, D., & Siapera, E. (2018). Special issue on online misogyny. *Feminist Media Studies*, 18(4), 515-524.
- Ging, D. (2019). Alphas, betas, and incels: Theorizing the masculinities of the manosphere. *Men and masculinities*, 22(4), 638-657.
- Hall, S., & Du Gay, P. (Eds.). (1996). *Questions of cultural identity*. London, UK: Sage.
- Hamari, J., Koivisto, J., & Sarsa, H. (2014, January). Does gamification work? -A literature review of empirical studies on gamifica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47th Hawai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ystem sciences, (pp. 3025-3034). IEEE.
- Han, X. (2018). Searching for an online space for feminism? The Chinese feminist group gender watch women's voice and its changing approaches to online misogyny. *Feminist Media Studies*, 18(4), 734-749.
- Hanser, A. (2005). The gendered rice bowl: The sexual politics of service work in urban China. *Gender & Society*, 19(5), 581-600.
- Han, X., & Yin, C. (2023). Mapping the manosphere. Categorization of reactionary masculinity discourses in digital environment. *Feminist Media Studies*, 23(5), 1923-1940.
- Hooks, B. (1989/2015). *Talking back: Thinking feminist, thinking black* (2nd ed.). New York, NY: Routledge.
- Hu, B., Luo, F. L., Peng, Z. W., & Lin, S. Q. (2021). Sexism and male self-cognitive crisis: Sentiment and discourse analysis of an internet event.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65(5), 679-698.

- Huang, Q. (2023). Anti-feminism: Four strategies for the demonisation and depoliticisation of feminism on Chinese social media. *Feminist Media Studies*, 23(7), 3583-3598.
- Hymes, D. (1973). Speech and language: On the origins and foundations of inequality among speakers. *Daedalus*, 102(3), 59-85.
- Jackson, S. M., & Cram, F. (2003). Disrupting the sexual double standard: Young women's talk about heterosexuality.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42(1), 113-127.
- Jia, L., & Han, X. (2020). Tracing Weibo (2009–2019): The commercial dissolution of public communication and changing politics. *Internet Histories*, 4(3), 304-332.
- Kristeva, J. (1969). *Séméiôtiké: recherches pour une sémanalyse*. Paris, France: Édition du Seuil.
- Liao, S. (2023). The platformization of misogyny: Popular media, gender politics, and misogyny in China's state-market nexus. *Media, Culture & Society*. Epub ahead of print 15 January 2023. DOI: 10.1177/01634437221146905.
- Manne, K. (2017). *Down girl: The logic of misogyny*.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endes, K., Keller, J., & Ringrose, J. (2019). Digitized narratives of sexual violence: Making sexual violence felt and known through digital disclosures. *New media & society*, 21(6), 1290-1310.
- Meng, B. (2011). From steamed bun to grass mud horse: E Gao as alternative political discourse on the Chinese Internet. *Glob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7(1), 33-51.
- Messner, M. A. (2016). Forks in the road of men's gender politics: Men's rights vs feminist all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Crime, Justice and Social Democracy*, 5(2), 6-20.
- Moloney, M. E., & Love, T. P. (2018). # TheFappening: Virtual manhood acts in (homo) social media. *Men and Masculinities*, 21(5), 603-623.
- Moon, Y.E., Kim, H.H. & Park, D. (2023). "Can I become a true feminist?": An interpretive analysis on the mirroring experience of young Korean women. *Feminist Media Studies*, 23(5), 2102-2118.
- Pateman, C. (1988). *The sexual contract*.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Peng, A. Y. (2021). Neoliberal feminism, gender relations, and a feminized male ideal in China: A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of Mimeng's WeChat posts. *Feminist Media Studies*, 21(1), 115-131.
- Retallack, H., Ringrose, J., & Lawrence, E. (2016). "Fuck your body image": Teen girls' twitter and instagram feminism in and around school. In J. Coffey, S. Budgeon, & H. Cahill (Eds.), *Learning bodies* (pp. 85-103). Singapore: Springer.
- Rubin, G. (1975). The traffic in women: Notes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ex. In R. R. Reiter (Ed.), *Toward an anthropology of women* (pp. 157-210). New York, NY: Monthly Review Press.
- Sargent, M. L. (2007, November). *Feminist mirroring and multi-tasking: women activists as producers, publicists, historians and copy cats*. Paper presented at 'Pen and protest: Intellect and action--A symposium in honor of Berenice A. Carroll' of Purdue University,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Women's Studies Program, West Lafayette, IN.
- Scotto di Carlo, G. (2022). An analysis of self-other representations in the incelosphere: Between online misogyny and self-contempt. *Discourse & Society*, 34(1), 3-21.
- Van Dijk, T. A. (1995). Discourse analysis as ideology analysis. In C. Schäffer, & A. Wenden (Eds.), *Language and peace* (pp. 41-58). London, UK: Routledge.
- Van Valkenburgh, S. P. (2019). "She thinks of him as a machine": On the entanglements of neoliberal ideology and misogynist cybercrime. *Social Media+ Society*, 5(3), 1-12. doi: 10.1177/2056305119872953
- Wallis C. (2017). Chinese women in the official Chinese press: Discursive constructions of gender in service to the state. *Westminster Papers in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 3(1), 94-108.
- Wrisley, S. P. (2023). Feminist theory and the problem of misogyny. *Feminist Theory*, 24(2), 188-207.
- Wu, A. X., & Dong, Y. (2019). What is made-in-China feminism (s)? Gender discontent and class friction in post-socialist China. *Critical Asian Studies*, 51(4), 471-492.
- Yang, W., Guo, J., & Arteel, I. (2023). What is "rural feminism"? A computer-assisted analysis of popular antifeminist discourses in Chinese social media. *Social Media+ Society*, 9(2), 1-13.
- Zeng, J. (2020). # MeToo as connective action: A study of the anti-sexual

violence and anti-sexual harassment campaign on Chinese social media in 2018. *Journalism Practice*, 14(2), 171-190.

Zhang, H. (2022, August 29). The censorship machine erasing China's feminist movement. *The New Yorker*. Retrieved from <https://www.newyorker.com/news/news-desk/the-censorship-machine-erasing-chinas-feminist-movement>

Zhou, J. (2003). Keys to women's liber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An historical overview.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Women's Studies*, 5(1), 67-77.